

# 徽州刻书业的衰落及其与徽商的关系

秦宗财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关键词:** 徽州; 刻书业; 衰落; 徽商; 关系

**摘要:** 清后期徽州刻书业的衰落表现在: 徽州官刻的式微、徽州本土私刻的衰微以及外埠徽州私刻的衰变。清后期徽商的衰落, 造成了徽州刻书业发展的窘境, 使徽州官刻、私刻以及刻工失去了资金支撑。

**中图分类号:** G239.2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08)02-0168-05

Decline of Book Engraving Industry in Huizhou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Huizhou Merchants QIN Zong-cai (College of Soc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Huizhou; book engraving industry; decline; Huizhou merchants; relationship Abstract: The decline of book engraving industry in Huizho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3 aspects: the fall of government book engraving in Huizhou, the wane of personal book engraving in Huizhou and the decay of personal book engraving in places outside Huizhou. The decline of Huizhou mercha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eprived government and personal engraving as well as engravers of strong financial support, leading to the predica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book engraving industry in Huizhou.

刻书业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 其兴衰也是社会文化发展与否的一个重要表征, 同时由于刻书业与社会经济关联密切, 其(尤其是坊刻)兴衰也是经济发展的一张“晴雨表”。探讨徽州刻书业的衰落, 有助于分析清后期徽州文化、经济的衰落问题, 也助于从反面去剖析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关于徽州传统刻书业的衰落, 也有一些论著提及<sup>①</sup>, 惜未能展开论述。关于徽州刻书业的衰落与徽商之间的关系方面的研究, 学界还没有专文论及。本文试就作进一步探讨, 以求教于学界。

## 一、徽州刻书业的衰落

明清两朝徽州传统刻书业发展至极盛, 据徐学林的不完全统计, 明清两代徽州府出版的万部以上图书中的家刻、坊刻, 就超过1300余家, 刻书品种近万种, 占全省刻书总数的3/4以上。若再加上一些特殊地方文献如各种志书、政书及私人刻印的地方风物、商品广告、家谱类书, 则超过万种, 占全省出版物总品种数的4/5左右, 在现今通行全国古籍约10万种中也占1/10以上。[1]30但这种发展趋势至清道光咸丰之后, 开始呈颓势。

### 1. 徽州官刻的式微

明清两朝徽州官刻数量总的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据刘尚恒统计, 明代徽州官刻书数量, 可考有府署刻书目22种715卷(含府属书院刻书), 府属各邑, 歙县刻书目2种28卷; 休宁县12种121卷; 绩溪县1种9卷; 婺源3种43卷。另外, 方志修刻数量可观,

收稿日期: 2008-02-20

作者简介: 秦宗财(1974), 男, 安徽芜湖人, 2005级博士研究生。

① 叶树声:《徽州历代私人刻书概述》,《徽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李忠林:《徽州刻书业论略》,《四川图书馆学报》2004年第2期;徐学林:《试论清末至民国前期安徽出版业的历史地位》,《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3-7期连载等。

府志凡 7 种 50 余卷(平均 30 余年一修);县志凡 17 种近 200 卷。[2]41-44 清代徽州官刻图书,“显然较之宋明徽州官刻书品种及数量皆所逊远矣,这首先与清代文字狱之烈有关,官刻书禁例之严,甚于私刻和坊刻”[2]92。确知的计府署所刻 1 种,县署所刻 26 种,府学所刻 15 种,县学所刻 3 种,合计 45 种。但是,清代官刻方志的出版超越前代,出版府志 5 种 87 卷,县志凡 26 种 400 多卷。由此,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朝徽州官刻书总量达 76 种 2000 多卷。但是这种官刻态势到鸦片战争以后趋向式微。

清末徽州官刻的式微,首先表现在刻书数量上的锐减。自鸦片战争后,徽州各县署所刻之书寥寥,仅见黟县同治十年(1871)在《黟县志》(17 卷,1812 年刻)基础上增补刻印《黟县二志》、《黟县三志》;祁门县同治十三年(1874)刻《祁门县志》37 卷;婺源县光绪九年(1883)刻《婺源县志》65 卷等为数不多的地方县志。另外,清同治年间,由曾国藩倡起,在各省设立官书局,由政府拨款,刻印图书。由于此时徽州传统官刻已呈颓势,安徽官书局——曲江书局设立于安庆,而在徽州,仍由紫阳书院继续刻书。

咸同间,紫阳书院遭兵毁,后安徽省筹工局拨款重修紫阳书院,并改为校士馆。鸦片战争之后,在安庆曲江官书局的影响下,紫阳书院将传统与近代印刷技术相结合,刻印了部分书籍。所刻之书大致有:光绪七年(1881)刻汪烜《书经诠释》14 卷;光绪九年(1883)刻汪烜《诗韵析》7 卷、《物论》9 卷、《乐经律吕通解》5 卷、《立雪斋琴谱》2 卷;光绪十年(1884)刻《诸近思录》1 卷;光绪末年刻《理学逢原》12 卷等。这些刻书与明清两朝徽州官刻总量相比,显然大为下降。其次,一些官刻机构的刻书活动基本上停滞了。如除黟县、婺源、祁门等县外,徽州府署、府学、歙县、休宁等这些曾经刻书活跃的机构几乎没有刻书问世。

鸦片战争后,徽州官刻图书寥若星辰,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一是资金不足,其二在于战争的破坏,特别是清军与太平军间的战乱,给徽州地区造成巨大的灾难。徽州大量藏书毁于战火,这给后世刻书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正如同治《重修祁门县志》序云:“大府倡修《安徽通志》,檄各府州县修志以备采择,非矜著作也。慨自发捻肆恶江南北,遍地干戈,其间户口逃亡,田地荒废,城垣毁坏,庙宇倾圮,一切人事物产,今昔悬殊,沧桑变改,将欲考之掌故,而简册剥残,书籍焚毁,如省志郡邑志千百,什一几于无存。”[3]序

## 2. 徽州私刻的蜕变

与道光以前明清徽州私刻人数相比,咸同光宣四朝徽州私刻人数锐减。据徐学林统计,明清两代私刻图书的多达 1300 多人(不含谱牒刻印者),其中明代有 500 余人,清代有 780 余人。而在清代私刻人数中,道光以前,刻书人数达 610 余人,其中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虽受文字狱影响,刻书人数仍近 400 人,占清代的 49.6%;而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只有 170 人,占清代的 21.6%。[1]45 虽然在同治光绪年间,徽州私刻(包括家刻、坊刻,下同)在部分后起的商人的苦撑下,数量有所回升,但整体上已经江河日下。与本土私刻相较而言,外埠徽州私刻开始吸收和采用近代先进刻印技术,逐步融入近现代文化启蒙运动中,并向近现代出版转变。

(1) 鸦片战争以后徽州本土私刻的衰微。首先,刻书人数锐减。徽州地区自遭太平天国兵乱后,商业经济败落,文风也已一蹶不振,明清时期“户户弦诵”、“村村刻镂”的局面,“嘉、道而后,此风漫衰矣”[4]卷 16,很多藏书楼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所藏典籍也所存无几。正如清末黟县文人何承培云:“咸丰、同治间,发匪数躏吾黟,世家大族、公私凋敝。乱定,能光缙前绪者十无四五。”徽州私刻书业亦遭致命破坏,事后恢复无几。在这种状况下,徽州私刻人数骤减。而能够继续坚持从事刻书的,只有少数一些官员和仍保留一些家底的徽商后人,刻书人数也是大大减少,明清时期私族累世刻书的现象已然难见,各县仅有的一些私刻情况,详见表 1。

表 1 清末 (1840-1911) 徽州地区私刻代表

地区	刻主	年代	代表刻书
绩溪	胡绍勋	道光二十四年	《四书拾义》6卷
	胡肇智	同治八年	《仪礼释官》10卷
		同治十二年	《说文管见》3卷
	胡氏世泽楼	光绪年间	《古韵论》3卷、《研六室文抄》10卷、《内经素问校义》2卷、《教士述言》3卷、《绩溪金紫胡氏所著书目》1卷、《文选笺证》32卷、《斋中读书诗》1卷
	胡嗣运	光绪二十三年	《鹏南集》50卷
		光绪三十四年	《枕蓆斋群经问答》3种45卷
	王子乾	光绪末年	《地学》、《矿学》、《力学》、《珠算速成》
	周懋泰	光绪末年	《说文部目音释》1卷
歙县	黄衡	道光二十一年	《碧云秋露词》2卷
	汪承熙	道光末年	《喉科症结》1卷
	王茂荫	咸丰年间	《王侍郎奏议》10卷 《琼州杂事诗》1卷
	汪宗沂	光绪十三年	《弢庐隶谱》2卷、《孝经十八章辑传》1卷、《龙经校注》1卷、《疑龙经校注》1卷
	吴楚	咸丰元年	《实命真诠》5卷
	吴锡纪	咸丰间	《近村文草诗章》不分卷
	吴玉辉	光绪三年	《毛诗补注》16卷
	江有诰	咸丰二年	《江氏音学》14卷
	胡谦光	光绪二十九年	《胡泰舒年谱》1卷
	郑西园	同治十二年	《喉科秘钥》2卷
	娄东养拙山人	同治年间	《资孝葬书述要》1卷
休宁	吕玉璜	道光二十九年	《刻烛吟馆诗抄》4卷
	汪氏	光绪六年	《藕丝词》4卷
	项氏	光绪末年	《苜绿庄焚余续草》4卷
	杨言	光绪末年	《左山遗草》1卷
	佚名	光绪末年	《四字经》1卷、《保赤全编》3卷、《不可录》1卷
	俞懋颖	咸丰二年	《四斋斋诗稿》3卷
	何朝贵	咸丰年间	《堪舆》1卷、《卜筮》1卷
	程鸿诏	同治年间	《有恒心斋全集》43卷
	佚名	光绪七年	《五方元音》2卷、《真修宝卷》1卷
黟县	黄氏	光绪十六年	《江南乡试硃卷》1卷
		光绪十三年	《檀弓》2卷、《标孟》7卷、《紫石山房集》15卷
		光绪十四年	《新安志》10卷
	李宗炯	光绪十九年	《鄂州小集》5卷、《罗鄂州遗文》1卷、《徐骑省集》33卷、《金忠节公集》8卷、《癸巳存稿》15卷
	李英之(宗炯子)	光绪末年	《孟子释疑》1卷、《十翼逸文》4卷
婺源	朱锡珍	道光二十七年	《忍字辑略》5卷
	程荣春	咸丰四年	《简练集》1卷
		同治七年	《战车练炮图说辑要》3卷
	李承超	同治八年	《车制考误》1卷
	王贞	光绪十四年	《小尔雅补义》1卷
	俞氏	光绪二十一年	《林和靖先生诗集》4卷
	余元遴	咸丰年间	《庸言》4卷、《染学斋诗集》10卷
	余宗英	咸丰年间	《禹贡辑注》1卷

注：本表只列代表性的刻书书目，也不含宗族集体刻书、谱牒、方志等书目

其次,由于战乱,徽州私家藏书遭到极大的破坏,不少图籍毁于战火,这也是徽州私刻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如黟县商人李有祥(字丽春),“年十六学贾于城肆,会计精密,不数年,屈其俦人,暇辄涉猎图史,旁及葬书。咸丰朝,邑遭洪杨之乱,族中祀产、簿籍俱灰灭”。[5]卷 14 余士溥(字博思),“先生性嗜学,手不释卷,无事不出户庭,家贫力难置书,或假于亲友,或租于书肆,焚膏继晷每至夜深,楷字钞录盈筐累篋。学问渊博,虽通儒尚不逮焉。医书汗牛充栋,各执一偏,先生融会贯通独有心得,以古圣经书为体,以后贤时书为用,临症时细心体会,议病立方,故能著手成春、活人无算。”但迭遭兵燹,家徒壁立,即存物亦复无存。[5]卷 14 何朝贵(字治平),其父字桥公服贾休阳,“同治二年寇至,公殉难于家庙中。所编辑《卜筮》、《堪輿》悉为灰炉”[5]卷 14。类似遭受破坏的家藏图籍事例举不胜书。因此,除谱牒外,徽州私刻图籍数量锐减,大部头的丛书、类书更是少见。再次,仍承袭统的刻印技术,先进的近代铅印、石印技术很被采用,表现了徽州私刻的保守。而且,失去厚的徽商商业资金的支撑后,以精美细致著称徽州版画也日趋衰微,特别是明代以来刻印技世代相传的刻印工出现了断层现象。

上述种种情况,导致了徽州刻本的刻印和帧质量也难以再现明清时期的辉煌,面对先进近现代的刻印技术的挑战,徽州本土私刻显得不从心,最终走向衰落。

## (2) 外埠徽州私刻的衰变。

与徽州本土相似,外埠徽籍藏书家很多遭兵火侵袭,所藏书籍破坏严重,这为后世刻书来严重影响。如原籍徽州黟县的汪宪,其“振堂”藏书为乾隆中杭州之冠,但“咸丰兵火后佚过半”,之后一蹶不振[6]卷 12。鸦片战争以寓居外埠的徽籍人士面对新旧交替,其文化观呈现了较复杂的多样性。在刻书方面,一些是商或官宦后裔,依然坚持传统刻书理念,从图选题到刻印装帧方面,都表现了保守的一面。表性的徽州私刻,见表 2。

表 2 清末 (1840-1911) 外埠徽州私刻代表

地区	代表私刻	刻主身份	原籍	年代	代表刻书
	黄承吉	盐商	歙县	道光二十二年	《义府》1卷、《字诂》1卷
	黄必庆 (承吉子)	盐商 后人	歙县	咸丰元年	《梦陔堂集》45卷
扬州	黄 爽	盐商 后人	歙县	道光年间	《汉学堂知足斋丛书》 215种
	鲍 康	盐商	歙县	同光年间	《观古阁丛刻》18 种、《皇朝谥法考》 5卷
	汪祖同		歙县	光绪年间	《容甫先生遗诗》 6卷
金陵	汪士铎	举人	婺源	咸丰年间 光绪七年	《水经注图》2卷 《汪梅村文集》12卷
	郑由熙	宦宦	歙县	光绪十六年	《暗香楼乐府》3种3卷
苏州	胡 珽 (树声子)	盐商 后人	休宁	咸丰四年	《琳琅秘室丛书》(木 活字版)4集30种 94集
	潘祖荫	盐商 后人	歙县	同治年间 光绪年间	《攀古屐彝器款识》2 卷、《古泉丛话》4卷 《滂喜斋丛书》61种 96卷
杭州	汪康年	徽商 后人	黟县	光绪宣统年间	《振绮堂丛书》24种 13册
仪征	吴引孙	盐商 后人	歙县	光绪年间	《有福读书堂丛刻》 25种57卷
常熟	鲍廷爵	商人 之后	歙县	同治、 光绪年间	《后知不足斋丛书》 47种
宁波	黄家鼎	商人 之后	歙县	光绪八年	《补不足斋杂著》 1卷

而一些外埠尤其北京、上海等地的徽籍文化人士,在启蒙思潮的影响下,文化理念开始发生转变。在刻书的选题方面,他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开始刻印新兴图籍,乃至从事近代出版事业;在刻印技术方面,开始接受西方先进的铅印、石印技术,将传统刻印方式与近代刻印技术相结合,实现向近代出版转变,如振绮堂传人汪康年(1860-1911),自其家世衰落后,常常慨叹缺乏资财刊印书籍,后汪康年加入维新运动,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创办或加入了《时务报》、《中外日报》、《京报》等新式期刊,积极从事新式出版活动,其后人秉承余绪,采用先进的铅印技术排印了《汪穰卿先生遗著》等书。黟县商人后裔汪大燮(1860-1929),迁居浙江钱塘(今杭州)。宣统二年(1910)六月,在其任驻英公使期间,学习西方出版技术,回国后编辑各类图书,向宣统帝进献“汪大燮进考查英国宪政编辑各书”[7]宣统皇帝本纪,编有《英国宪政丛书》、《分类编辑不平等条约》等图籍。汪孟邹(1878-1953),安徽绩溪县人,近现代出版发行家。1903年冬在芜湖长街徽州码头开设芜湖科学图书社。经营反映新文化和马列主义的书报杂志。1904年陈独秀在该社主编《安徽俗话报》,汪孟邹也参与编辑发行工作。

## 二、徽州刻书业的衰落与徽商的关系

徽州刻书业的衰落与清后期徽商的颓败关系密切。与刻书业相关的一些手工商业的颓败,造成了徽州刻书业发展的困境。同时,失去了徽商强有力的资金支撑,徽州刻书业无疑釜底抽薪。

## 1. 与刻书业相关的徽商行业败落造成了徽刻发展的困境

纸业、制墨业、雕刻业等是徽州的传统手工行业，它们在徽商的经营下，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技术要求，明至清中叶其发展均达到极致。而这些行业又与图书生产所需的原料、制作技术和刻印方法都比较接近，因此常常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影响。从而为徽州书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就纸业来说，徽商好古董、爱收藏，故书旧纸也是他们爱好收藏的对象，因此，徽州的造纸业迎其所好，仿宋纸、皮纸甚行。明屠隆《考槃余事》载：“新安（徽州）仿宋藏经纸亦佳。有旧裱画绵纸（皮纸），作纸甚佳，有则宜收藏之。”[8]37 这种纸型的盛行，也影响到徽州书业纸张的采用。就制墨业来说，自唐宋以来，徽州制墨业一直保持着对模范的形制、花纹要求精雅的传统，墨范常在方寸之内表现人物走兽、花草翎毛、屋宇庭榭，却不允许出现丝毫误差。制墨业的这种雕镂技艺被徽派版画的刻工们融会贯通地利用到版画的雕刻上，并且不断发展，他们的刻技逐渐达到了“线条细若毛发，柔如绢丝”的程度。就雕刻业来说，徽州“三雕”虽然材质、表现手法不尽相同，但在艺术风格上却颇有异曲同工之处：细腻繁复、层次分明、虚实相间、精巧多变。徽州三雕的行业技艺使版画艺人受益颇多，在徽派雕刻技艺的影响下，徽派图书插图版画便形成细腻、繁复、精致的风格。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徽墨受西方钢笔墨水的冲击，徽州纸及其生产技术遭受到西方新式机器造纸技术的冲击，而讲究精雕细刻的手工雕刻业则受到铅印、石印技术的冲击，等等。所有这些表明，在徽商传统手工商业整体趋向衰落的背景下，以效率低下的雕板、活字印刷技术为支撑的徽州传统刻书业尤其是坊刻，其黄黑粗劣的纸张、呆板的方体字，与新兴的铅印、石印技术相比，在市场竞争上凸显了劣势。以造纸为例，曾经引以为傲的造纸术也受到了新式机器生产的排挤。安徽使用印刷机器在清末民初。据《宣统政纪》载：宣统二年（1910）八月安徽巡抚朱家宝奏设安徽官纸印刷局。奏折中说：“印刷一项虽属营业性质，而于文化书契券等件，往往动关法制。现就藩司署内设立安徽官纸印刷局，购买机器及一切开办经费，由司筹款拨给。其印刷品定为官用、民用、商用三种。除商用品应准该商酌定格式，随时议价；其官用、民用各品，均由局定式、定价。”该局设在安庆藩司署内，也是安徽早期的官营的新式印刷机构之一。从此以后，机器印刷术在安徽逐渐代替了雕版印刷术或木活字印刷，为公私出版家所广泛运用。[9]56 有学者认为，徽州偏安一隅，外国机器生产对徽州本土影响较小，此说有失偏颇。虽然看似对本土影响较小，但是，对徽州外埠刻书却是打击很大。同时，徽州外埠刻书与徽州本土刻书是休戚相关、密切联系的，外埠徽州刻书的萎缩，必然波及徽州本土（如资金、销售等），也就必然影响到徽州刻书的整体状况。

总之，在近代机器生产的冲击下，与徽州传统刻书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几种传统手工商业——雕板或活字、墨、纸等行业受到致命打击，造成了徽州刻书业发展的困境。

## 2. 徽商衰落使徽州官刻、私刻失去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撑

无论是徽州官刻，还是徽州私刻，其资金绝大部分来源于徽商的捐助。特别是徽商参与到私刻行列，成为明清徽州私刻重要力量之一。清末以后，随着徽商衰落，徽州官刻和私刻失去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扬州盐商衰败后，扬州书业也一蹶不振。阮元说：“造园旧商家多歇业贫散。书馆寒士亦多清苦。吏仆庸贩皆不能糊其口。”在这种窘况下，何谈刻书？徽商后裔潘景郑目睹家世衰变，慨然道：“自丁丑距今，且百二十余年，世变沧桑，家国全非，衰综不振，斯文垂绝。予小子忝纘遗绪，永慕祖芬，大厦将倾，一木谁支？”[10]337 表现了家世衰变后藏书、刻书难继的无奈之情。特别指出的是，徽州私刻中的坊刻作为徽州商帮整体中的部分，徽州坊刻主本质是封建商人，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性，其商业经营理念、商业经营模式以及商业资本封建化等方面都鲜明地表明了其封建商人的一面，这就决定了其必然与封建社会共存亡。同时，徽商根深蒂固的宗族性，决定了徽州坊刻必然随着徽商整体而衰落。

清末，在后起的黟县、婺源等部分商人的支撑下，徽州私刻有所起色，但这也只不过是衰亡前的回光返照。清末黟县商人对徽州书业的苦苦支撑，以光绪年间的黟县商人李宗焯为代表。文献记载，李宗焯“刊徽州乡贤遗集数百卷；捐置各省书籍致之国子监南学及焦山书藏”，“于乡邦文献，尤考求弗懈。祀命理初先生乡贤，刻其遗稿，罗端良、金正希、吴殿麟、汪南士诸先生撰著皆重刊流布之”。[11]卷 14 李宗焯与其子李英之搜集乡贤遗著，广为刊刻，成为晚清徽州私刻中的一大亮点。尽管如此，也终究挽救

不了走入败势中的徽州书业。

3. 失去徽商的支撑,徽州刻工也难以为继以徽州版画为例,版画艺术由于徽商的参予和操作,把名画家、名刻工和名印工集合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而臻完善,从而达到至高之界。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又暴露出集体合作的弊病。因为作为集体创作的产物,绘、刻、印和主持者,缺少或有一个环节薄弱,作品都不能获得成功。清乾隆以后,作为徽派版画最大支持者和主持者的徽商开始走下坡路,徽派版画也开始走下坡路。版画艺术发展到这个阶段,必须走集绘、刻、印于一人之身的道路,必须完全抛弃商业行为,艺术之树才能保持常青。于是自绘自刻自印的现代版画便应运而生。

其次,刻工刊刻的图书是属于观赏型的消费品,既受商业市场的影响,也为时尚所制约。徽商的衰落,导致徽州刻工创作的作品丧失了一个重要的欣赏群体。同时,随着新式印刷工具的出现,传统刻印作品的艺术魅力敌不过新式印刷工具印刷的作品。“自欧风东渐以来,西洋装订传入我国,线装书又称古书矣。”(《黄宾虹书画讲习录》)这表明在西方图籍装帧形式的排挤下,中国传统装帧形式已经落伍。在这种情况下,徽州刻工传统技艺拥有的市场也相应的萎缩衰减。另外,清道咸以后传统图书市场的萎缩,代之而起的是新兴官书局的中兴。叶德辉云:“咸丰赭寇之乱,市肆荡然无存。迨乎中兴,曾文正首先于江宁设金陵书局,于扬州设淮南书局,同时杭州、江苏、武昌继之……自学校一变,而书局并裁,刻书之风移于湘、鄂。”叶氏对新旧交替的历史变迁未能有正确的认识,面对传统刻书的日渐萎缩,大声疾呼:“危矣哉!刻书也。”[12]247 这固然反映了其思想的保守一面,但却反映了当时传统图书市场在新兴的刻书形式面前日渐衰落。国内传统坊刻尤其是徽州坊刻的衰落,直接导致了徽州刻工劳动市场的萎缩,迫使大量徽州刻工改行,另谋出路。

#### 参考文献:

- [1] 徐学林. 徽州刻书[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 [2] 刘尚恒. 徽州刻书与藏书[M]. 扬州:广陵书社, 2003.
- [3] 周溶修,等. 祁门县志[0]. 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 [4] 石国柱,等. 歙县志[0]. 民国 26 年(1937)铅印本.
- [5] 吴克俊,等. 黟县四志[0].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
- [6] 丁丙. 善本书室藏书志[M]. 清光绪刻本.
- [7] 赵尔巽,等.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8] 屠隆. 考槃余事[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7.
- [9]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志·出版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8.
- [10] 潘景郑. 著砚楼读书记[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 [11] 谢永泰,等. 黟县三志[0].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
- [12] 叶德辉. 书林清话[M].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